★国际论道

G7已近，G20不远

世界期待中国发挥更多“领导力”

本报记者　宦　佳

失意的G7：
【“没有一个能应对问题的方法”】

面对全球经济近乎陷入“滞胀”，同时多年激进的货币政策已经逼近极限的背景，疲惫的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难以弥合。

日本经济新闻23日报道称，刚刚在日本仙台市闭幕的G7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确认了平衡货币、金融和结构改革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方针。“虽然主席国日本呼吁各国动用财政，但未能获得全面支持，各国将各自判断。”该报道称，自从2008年秋季雷曼危机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成为了财政协调的舞台，而并非是G7。当前随着主要国家的危机感下降，全球经济的过度悲观论有所缓和，但美国和日本等在是否动用手段干预日元汇率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凸显。

看上去，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不断上升，作为发达国家的讨论机构，G7似乎更需要为全球经济稳定发挥带头作用。在这次“颇为失败”的G7财长会议尾声，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也总结称，“七国的处境不同，但我们有必要就均衡地利用金融政策、财政措施和结构改革等各种政策手段达成一致。”

但是梦想不敌现实。“德国之声”称，会议达成的唯一共识是，没有一个能够应对所有问题的方法。

路透社报道称， G7在财政政策与汇率方面的裂痕有可能令G7成员国达成“各走各路”的共识，以此化解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该媒体也援引消息人士称，“与其依赖短期财政或货币政策刺激，还不如实施结构性改革并叠加适当的投资，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这倒是契合了与此前在上海召开的G20财长会议的主要主张。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称，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表示，各经济体应遵守今年在上海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作出的汇率政策承诺，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维护全球经济的信心。

新旧秩序的交替：
【“G20将为主要大国应对挑战定调”】

解决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着更为广泛的挑战，而这显然已经不是几个主要发达国家有能力完全应对的。法国《回声报》网站刊文称，“全球层面的货币政策就像当下的动荡一样：独立且分散。各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显出自身的局限，并且因缺乏相互协调而消融。”

在一个不相协调的全球经济政策空间中，缺失全球火车头意味着困难必然如期而至。G7依旧想当这个“火车头”，但是它总是“跑偏”的关注焦点难以让彼此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此前中国外长王毅曾表示，希望G7能和G20一样，聚焦目前世界各国最关注的经济与发展议题，与G20良性互动。他称，“如果有些国家出于政治目的，把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甚至领土和主权争议的具体问题带进G7会议，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影响地区局势稳定，显然是不可取的。”

但G7显然没听进去。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G7外长会议上，除了汇率议题之外，日美依旧主导着对中国的讨论。虽然日美再次强调“不能容忍中国在南海推进军事化的原则”，但是就参会代表的讨论来看，“与南海相距遥远的欧洲与日美的危机感存在差距”。

失意的G7与全球对G20赋予的期待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时代》周报网站刊文称，在13周前举办的G20上海财长会议上，各国“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了所有与会国共同担责的文本”。

G20引起关注的，恰恰是通过结构性改革寻找全球经济治理的“药方”。“中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正值G20和中国的重要时刻。”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刊发《二十国集团观察》报告称，人们对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这一年寄予厚望。由于中国设定的四个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中国将利用它准备的主题来解释其对世界采取的经济方针，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更好合作。要取得超乎寻常的成果，就需要中国把宏观经济讨论置于一个全面均衡的背景之下。

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新的贡献，这是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担负的时代责任与期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文称，中国在2016年接任G20主席国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开端，为全球治理和解决大国关系问题搭建了桥梁。从根本上说，G20将为主要大国如何处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定调。

“作为管理全球事务的旧秩序的代表，G7重点关注的仍是世界经济，但它现在也格外重视跨领域的安全问题。G20则是一种新的多极国际秩序机制，已崛起的大国和新兴大国可以通过该机制展开合作。但到目前为止，G20成员国仅将讨论范围局限于经济问题。”该文章称，全球治理将比以往更加多极化，我们必须找到新方法来分担首先采取行动和承担费用的重任。

改革做足铺垫：
【“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理性”】

世界对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G20充满期待，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确实提出了有别于美日主张扩大刺激和德国反对刺激之外的实实在在的“第三条路径”——结构性改革，这无疑切中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弱项。法国欧洲时报日前刊发评论称，当前G20成员各自独立、侧重短期的危机处理模式，引发了外界对“竞争性贬值”、“货币战争”的担忧，而结构性改革的倡议有利于将G20这个多边组织渐进为一个进行长期规划的平台。该媒体称，“中国经济主张在这个多边场合展现出来的正能量和生命力，也将为9月的G20领导人峰会做足铺垫，更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理性与建设性。”

而中国落实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也被全球“点赞”。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刊文称，在国际商业活动的推动下，北京提升了在世界各地的“软实力”，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个现象意味着中国经济正走向成熟，”该媒体援引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梅丹的观点，认为中国政府推动企业国际化的目的在于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培育新的市场，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并让它们的技术得到国际认可。

有不少外媒都注意到了近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象。比如，“中国投资德国进入2.0时代”。德国《经济新闻报》22日称，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最新报告显示，2015年外国对德投资再次打破纪录，投资排名第一的又是中国。德国《明星》周刊则称，与10年前相比，现在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更倾向高技术领域，尤其是机械和设备工程、汽车零部件、环保技术、金融服务等。

另一个近期的典型例子是印度。日媒称，“中国企业进驻印度的热情正在不断高涨，印度方面对中国企业的评价也有所提高。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印度作为潜力市场的存在感出现增强。”该媒体称，“2015年，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不包括再投资）猛增至8.7亿美元左右，是2014年的6倍以上。在中国的各大企业相继公布大规模投资计划的背景下，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比例很可能出现提高。”

中国值得信任，G20值得期待。印尼《雅加达邮报》刊登澳大利亚前外交官理查德·伍尔科特的文章称，对澳大利亚而言，在当今这个通常被称为亚洲世纪的时代，要善于利用G20、亚太经合组织等现有机制，采取大胆行动，把澳洲转变成为一个“与时俱进、并且是亚洲和西太平洋区域的现代成员”。

专家解读

对G20可施加『技术性改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　徐洪才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国经济走势和政策严重分化，特别是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负面溢出效应增加，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迫切需要完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合作首要平台，在共同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权威性不够、执行力不足等问题。在新形势下，G20的使命和定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从短期应对金融危机转向促进全球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G20第11次领导人峰会将于今年9月份在中国杭州召开，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我国作为此次G20领导人峰会的轮值主席国，应该抓住这一“二十年等一回”的机遇，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引领G20机制转型，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其中最为重要和迫切的议题，就是设立G20秘书处和完善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已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G20施加“技术性”改造，完善G20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具有现实可行性。一直以来，G20会议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信息交流和政策沟通平台，表现十分活跃，但其最大不足就在于缺乏执行力，有可能沦为“空谈俱乐部”，因此影响了G20的权威性。近年来，G20成员国一直有设立G20秘书处的呼声。G20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负责G20相关会议休会期间各项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其优点就在于它是长效机制，有助于提高成员之间政策沟通、协调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有助于督促G20相关决议落实和加强G20与其他国际组织协调。设立秘书处还可以避免G20会议议题和风格受轮值主席国的影响。

在建立G20秘书处等长效机制的同时，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成员的五大经济体，即美国、欧盟、中国、英国和日本，都是当今世界的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其中任何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变化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加强五大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无疑有助于有效减轻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负面溢出效应，及时化解各种潜在风险，进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所谓“5+1”，即美国、欧元区、中国、英国和日本，再加上IMF。“5+1”定期开会，对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货币、汇率、贸易和结构性改革等进行磋商和协调，可以扩大五大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正面溢出效应，减少其负面溢出效应。

重点关注

欧盟应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当下的问题是，在欧洲正应对其他各种冲突和分歧之时，欧盟领导人到底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一事视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帮助，还是视为障碍。从原则上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会不会带来欧元区经济增长所急需的新资源？会不会从北京那里获得在欧盟其他问题上的更大政治支持？

从狭义角度看，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会威胁或伤害欧洲的一些既得利益。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确实会提供至少能将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立于更坚实的战略基础之上的机会。眼下，中国很重视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那里获得这一地位。虽然今天欧盟经济对中国仍然十分重要，但这一重要性可能会日渐衰弱。再过5年或10年，欧盟的货币也将会衰落。或许欧盟最好还是在自己占据有利地位时好好讨价还价一番并获得一些利益。当然，经济学家们可能会上蹿下跳地提出猜测性的证据，证明此举带来潜在伤害，但政治益处才是需要真正关注的焦点。从长远来看，这些益处将带来与中国的更牢固关系和更大的影响力。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

只让中国当“替罪羊”不公平

作出承诺就不能反悔，尤其是在已签署协议，并通过欧盟法规确定下来的情况下。难道可以称其子虚乌有吗？

中国加入世贸之时，北京和布鲁塞尔已经谈妥，但欧盟现在却有顾虑。当时，中国被归入过渡时期“非市场经济”，也是合理的，欧洲的自由市场必须受到保护。但入世协议的第15条却保证中国在15年后（就是2016年12月11日之后）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针对其低廉价格的保护性措施也必须削减。从司法角度来说，中国可以自动获得这一地位。欧盟委员会的司法部门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世界经济持续降温让全球钢铁企业难以为继。现在只让中国当替罪羊是不公平的，不能解决该行业的结构性问题。中国迟早会获得或者被赋予它所向往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欧盟必须找到妥协的办法，欧洲议会的决议毕竟不是法律。

——据德国之声

中国可能采取法律行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欧洲议会的投票并无约束力，但它向欧盟委员会发出了一个信号，后者今年必须就这件事提交议案，然后由欧洲议会投票决定是否批准。

若中国赢得市场经济地位，将使外部世界更难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开征反倾销税。它将要求贸易伙伴在计算相关产品的价格是否低得不公平时，将本国市场的价格与中国国内经济中的价格进行比较。在中国没有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进口国可以用第三国的价格作为基准，这使他们能够选择一个有利于自己主张的国家。

来自荷兰自由党的欧洲议会议员玛丽切·沙克在欧洲议会投票后警告，中国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一个我方可能败诉的案子，那意味着我们还是会被迫拿出一种新对策，”她说。

——据《金融时报》

中国城市消费者进入无现金社会

在中国城市餐馆里，如今顾客埋单时更有可能掏出的是手机而非钱包。这凸显移动支付平台正迅速普及，并推动这个国家的城市消费者跨越信用卡阶段，直接进入无现金社会。

对1000名中国城市消费者进行的调查发现，98.3%受访者表示过去3个月内曾使用移动支付平台。在这个多项选择调查中，受访者表示最常用的支付平台是支付宝，比例为79.5%，明显高于选择其他支付方式——信用卡（45.5%）、借记卡（30%），甚至超过选择现金支付的比例（79%）。另有26%表示最常用的是微信支付。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人均持有的信用卡数量已从前年底的峰值0.34张跌至0.29张。与此同时，移动支付平台用户数量猛增64.5%，达3.577亿。

——据《金融时报》

中国网络消费成转型重要动力

近期，中国发布了首个网络消费指数。统计显示，中国网络消费规模指数过去五年扩大了12.1倍，显示网络消费迅速且强劲增长，正在成为经济运行的“压舱石”。

数据也表明，中国的网络消费正在从实物型向服务型、从生存型向享受型升级。与买包包等实物型网络消费仅仅扩张8.6倍相比，吃喝玩乐等服务型网络消费（餐饮、航旅、教育、生活服务）规模指数扩展了70倍以上，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蚂蚁金服总裁井贤栋指出，消费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贡献度越来越大，已经成为经济转型中的重要动力。数据显示，去年网络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29.1%。

——据《联合早报》

海外声音

中国电子市场前景广阔

在上海举行的第2届亚洲消费电子展上，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会总裁盖瑞·夏培罗在阐述登陆中国大陆的理由时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市场。”据德国调查公司捷孚凯统计，世界家电市场规模约为1万亿美元。中国大陆占1/4以上，预计将很快超过美国。

实际上，欧洲最大的柏林消费电子展也于4月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以美国和欧洲市场为主的知名展会纷纷选择了同一舞台，这已暗示了中国大陆市场的广阔前景。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大陆企业发展迅猛。正在手机领域撼动三星地位的华为技术确立了高级品牌的地位，成为上海展会上的全场焦点。

——据《日本经济新闻》

参观者观看一款儿童陪伴机器人。（据新华网）

美国电影将在中国制作

中国2017年将成为世界头号电影市场。随着好莱坞众巨头签署协议，面向美国和世界观众的电影可能在中国制作，美国最有名的出口产品很快将变成进口了。《蝙蝠侠》系列电影制片人迈克尔·奥斯兰表示，他和中国电影业公司已经签署发展协议。

虽然中国的电影公司没有要求奥斯兰的电影必须在中国拍摄，但他们在内容上的确有话语权。奥斯兰说：“以后电影制作方必须考虑文化敏感性。”他认为，如果在电影圈混，必须同马上到来的世界最大电影市场打交道。

——据福克斯新闻网

投资扩大是否增加资金压力

北京正在考虑的另一种方法是，重新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虽然各省市目前只掌握了50%的财政收入，但它们却承担着80%的公共开支。到目前为止，它们主要依靠出售建设用地的方法来维持收支平衡。然而，随着房地产危机的出现，这一财源将接近枯竭。为了应对减税所带来的后果，中央政府已宣布将承担更多的投资份额。但这一政策可能会给中国整体经济带来更大的资金压力。不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央行仍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储蓄率很高，而且大部分债务的持有者是中国人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拥有很大的行动余地。

——据法国《世界报》